

移民岁月

第十四期

YI MIN SUI YUE

“三线”建设与工业移民（二）

刘天明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为“三线”建设而迁移到宁夏的大批工厂及其人员，使宁夏工业得到飞跃性的发展。1965年7月1日，由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迁建的吴忠配件厂建成投产，批量生产东方红-54型和4146型活塞。这是“三线”建设中在宁夏建成投产的首家企业。1965年，由沈阳市第三橡胶厂和青岛橡胶二厂部分迁建，并于1965年12月31日基本建成新的银川橡胶厂；1965年2月，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435室、436室、215室合并迁建的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在石嘴山大武口开工建设，年底建成；1965年10月1日，由北京仪器厂迁建的青山试验机厂在青铜峡县建成投产；1965年10月25日，由大连机床厂迁建的长城机床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65年11月15日，由大连起重机器厂迁建的银川起重机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65年12月1日，由辽宁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迁建的大河机床厂在中卫县

建成投产，随迁职工663名（《宁夏通志·工业卷》纪事中记述此事的时间为1966年3月10日）；1965年，青铜峡铝厂在山东铝厂、郑州铝厂、抚顺铝厂、兰州冶炼厂等厂家的设备、技术和人员支持下，再度上马。石嘴山钢铁厂于同年改建和扩建，鞍山钢铁公司、天津市冶金局、本溪钢铁厂支援了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机器设备；1966年2月，由大连仪表厂迁建的宁夏银河仪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66年3月30日，由上海自动化仪表七厂迁建的吴忠仪表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1966年7月18日，在中央“三线建设”方针指导下，煤炭工业部决定，按照国家关于“靠山、分散、隐蔽”以及“工农结合、厂社结合”的建设方针，在宁夏大武口兴建西北煤矿机械成投产；1966年2月，由大连仪表厂迁建的宁夏银河仪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66年3月30日，由上海自动化仪表七厂迁建的吴忠仪表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1966年7月18日，在中央“三线建设”方针指导下，煤炭工业部决定，按照国家关于“靠山、分散、隐蔽”以及“工农结合、厂社结合”的建设方针，在宁夏大武口兴建西北煤矿机械

到1970年年底，共调入1400多人，其中张家口600人、淮南500人、抚顺300人；1969年9月12日，由沈阳市中捷人民友谊厂迁建的长城机床铸造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69年10月1日，由辽宁省瓦房店轴承厂迁建的西北轴承厂在平罗县建成投产；由天津市红旗仪器厂迁建的吴忠微型试验仪器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1970年4月10日，由山东省732厂迁建的胜利阀门厂（代号9922厂）在银川建成投产，并于1984年3月更名为兴庆机器厂；1970年9月15日，由张家口煤矿机械厂、淮南煤矿机械厂、抚顺煤矿机械厂分别迁建的西北煤矿机械一厂、二厂、三厂在石嘴山市大武口附近建成投产。1973年，成立西北煤矿机械总厂，统一领导。1976年10月1日，由吉林省524厂迁建的红卫机械厂（代号5233厂）在固原县建成投产，于1980年8月改名宁夏清河机械厂。这是“三线”建设中从外省最后迁移到宁夏的工

厂。至此，浩大的“三线”建设工厂迁移结束。“三线”建设中有多少人员随迁不详，但是所有工厂的搬迁都是包括人员随迁的，其数量十分庞大。

“三线”建设中迁移大量的工厂及工业队伍，对我区工业发展意义重大。第一，使我区工业门类增多，规模扩大。1978年与1964年相比，工业企业单位数增加1.4倍，达到1072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发展到27个。第二，工业经济获得高速发展。1978年与1964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9.5倍，达到14.4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8.3%，固定资产（原值）增长8.7倍，达到20.2亿元。第三，工业职工队伍得到迅速扩大。1978年与1964年相比，所有职工人数增长3.8倍，达到14.3万人。第四，工业成为宁夏的主导产业。1978年我区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由1964年的24.8%上升到68.9%。工业已发展成为宁夏的主导产业。

一声命令 一生坚守

——记原中央警卫部队50多名复转军人扎根西吉的故事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一组

征集宁夏移民史料的过程，其实就是挖掘一段艰难创业的历史过程，就是挖掘一部奋斗和光荣的历史过程。2020年的一天，当我们走进固原市西吉县时，一位支宁人的后代，西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王吉安，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父亲和曾经中央警卫部队的50多名战友，因为一声命令永远扎根宁南山区西吉县的故事。

王吉安回忆说：听他父亲讲述，自治区成立以后，1965年，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及宁夏缺少干部，希望中央能够予以解决。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协调，把即将要复员转业的中央警卫部队50多名官兵分配给宁夏，支援宁夏建设。50多名官兵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宁夏的情况，只知道宁夏是边疆，是黄土高原，条件艰苦。他们老首长的一席话，让他们铭记心中：“这就像是战场，让你们支援边疆，建设宁夏，这就是命令，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部队，命令，就是党中央的命令！”50多名复转官兵热血沸腾，把老首长的一席话，铭记心中，而且一记就是一辈子。

就这样，这批1958年入伍

的，以河北和湖南籍为主的官兵，离开了北京城，离开了他们服役了整整七个年头的军营，奔赴宁夏的大山深处。临行前组织要求他们，没成家的在一个月內抓紧成家，成家了的收拾东西，准备成家迁移，支援宁夏建设。1965年5月，50多名官兵，拖家带口，全部抵达宁夏，辗转来到了西吉县。

当时的西吉县城没有像样的公路，没有拔地而起的高楼，也没有青砖瓦房，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四面高山和一些土坯房子。

50多名官兵被分配到西吉县的各行各业，有的分到银行，有的分到供销系统，还有的分到粮食系统，而更多的则分到了兴隆、将台、马莲等乡镇从事基层工作，一家分配一间土坯房子，虽然条件比较艰苦，可对他们而言，组织上分配到哪，哪就是战场，就是他们战斗的地方。

在西吉县安家落户以后，这50多人每人每月可以领到27斤粮票，有一部分家属也分到了工作。像王吉安母亲之前是火车司机，调过来后在西吉县农机修造厂上班。西吉县的农机修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逐渐兴隆起来的。还有一部分复转官兵的家属没有分配工作，尽管她们有文化基础，甚至学历不低，但因没有安排工作便做了家庭主妇。这么多年来，每当心里委屈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老首长的话，把西吉当作第二故乡，无怨无悔，在艰苦的山区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名复转军人瞒着战友，借回河北老家探亲之际，办理了调动工作，并给王吉安的父亲写信叫他们赶快回河北老家。按照当时的情况，部队转业的干部，在外地待了这么多年，只要想回到原籍县城，县里就能给安排好的工作。王吉安很清楚的记得，他的父亲不仅拒绝了，还一直说这个叔叔是“逃兵”，给我们保卫党中央的部队丢人。

在与这些复转军人的后人们交流的时候，早已看不出他们是外乡人，一口纯正的西吉话，比当地人说的还地道。作为这批复转老兵的第二代，王吉安深有感触地说：“看到我的父辈当时过的那样清贫，心里真的不是滋味，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怨言，也没有要求

进城，许多父辈直到退休才从乡镇搬到县城。他们那辈人从来没有求过啥，但是让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就是，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对工作的执着与坚守。我工作以后，从来没有刻意为自己的升职或前途奔波，只有努力的工作，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这50多名老兵，很多人都已经去世，在世的也因年纪较大无法诉说他们的故事。从第二代王吉安等人口中听到的故事虽然很平凡，这个群体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身上那种忠诚、执着和奉献一生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他们的人格是伟大的，精神是闪亮的。

走出大山，感悟良多，因一声命令，就舍弃繁华与荣耀，扎根西吉，甘愿艰苦与奉献。坚守一月、一年也许容易做到，但是一生坚守却弥足珍贵。或许像他们这样的支宁人，在宁夏还有很多，他们所在的岗位平凡而又普通，他们的故事平淡又朴素，但他们每一个人，都闪耀着时代的光辉，闪耀着精神的力量。

（祖宁平 杜恩东 整理）

十万浙江青年支援宁夏（一）

支宁带队干部 汪智泉

号 召

支宁工作是在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形势下，为了使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一样齐头并进加快发展，国家从内地动员大批青年劳动力和科技人才，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支援宁夏建设是根据1958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要求从河北、河南、上海、广东、湖南、湖北、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四川各省动员570万青年、对口支援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支援工作由国家农垦部、各省党委负责动员组织。

动 员

浙江从省到各市县、乡镇，都成立了支宁委员会和办公室。各县用广播电台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各级领导召开支宁工作会议，各乡、村部召开党员会、团员会和社员大会，宣传党中央的决定和支援宁夏、建

设边疆、保卫祖国的重要意义，介绍天下黄河富宁夏，是塞上江南和鱼米之乡。宣传富饶的宁夏“处处有宝藏、遍地是牛羊”。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复员军人和有文化的优秀青年带头，“一人支宁、全家光荣”。宣传中各乡镇还规定，思想落后的、身体有病的、家庭有拖累的、地富分子四不要、四不批。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广大青年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怀着到大西北去、到宁夏去、建设祖国、保卫边疆的雄心壮志，积极报名，纷纷写申请书、决心书，表达支宁的决心。然后由乡镇（公社）党委研究批准，召开村民（社员）大会，公布批准名单。同时，将批准名单又用大红纸张贴公布。由乡镇干部将《支宁光荣证》敲锣打鼓送到各家，各乡村召开群众大会给每个支宁青年披红戴花照相留念。给每人发了一件棉大衣、一顶棉帽、一双棉鞋，将支宁青年送到县、市中按军事化编制，县、市为团，区、乡、村为营、连、排。最后将他们送到火

车站，由地区和有关市县党政领导主持召开欢送大会，由带队干部、护送干部负责护送专列火车跨过长江、飞越黄河，经过七天七夜，将支宁青年安全送到了宁夏。

在支宁十周年、二十周年，浙江省曾发来慰问信。在支宁三十周年，浙江省委和政府以及义乌市、余姚市等县市三级组织了慰问团，来宁慰问支宁人员，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支 宁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1959年1月12日。宁夏党委派政府副主席马玉槐到浙江，和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丰平举行会议。两省区商定，从1959年开始，五年内从浙江省动员30万青年支援宁夏建设。浙江省成立了支宁委员会，负责动员工作。宁夏成立了自治区安置来宁人员委员会，马玉槐任主任，民政厅长刘震寰任副主任，在民政厅设立安置办公室，负责支宁人员接收安置工作。

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两年，浙江省动员了103000名优秀青年支援宁夏。支宁人员男女各

半，平均年龄21岁。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21000名，还有一批复员退伍军人，科技人员。安置到宁夏川区11个县（市）农村的50175人，安置到国营农、林、牧场的41325人；安置到自治区各市县机关、工业、交通、文化、卫生、水利、电力部门的11500人。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支宁人员的安置工作，各市县、农场、单位都成立了安置委员会和安置办公室，从各地采购了8000多立方米木材，17000立方米玻璃，在各市县农村新建一批砖瓦房，供农村支宁人员居住。自治区从财政拨款出一批安置经费，按每人400元开支。安置到农村的，每人每月15元、家属10元，定期发给生活补助费。

1959年6月，第一批浙江杭州等市县支宁人员专列到达银川火车站。自治区、银川市党政领导和银川各界群众在火车站广场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金璋致欢迎讲话，会场张贴欢迎大标语，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气氛十分热烈，支宁青年也十分激动。之后的支宁青年也分批到达各市县。

元昊问鼎中原

公元1038年，宋仁宗接到一封表章，是党项族首领元昊请求封疆裂土建邦立国，表章上书：“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部之地，册为南面之君。”表章不长，文辞很美，所示态度却极为强硬。宋王朝对于元昊公然问鼎的举动，大为恼怒，宋仁宗立即下诏削夺元昊官爵及撤销所赐皇姓（即赵姓），停止边境贸易，并张贴布告，悬赏重金高官捕杀元昊。

然而，宋朝的恐吓和封锁，丝毫没有改变元昊称雄建国的决心，于是年十月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筑坛受册，登上皇帝宝座，正式建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西夏是以我国西部党项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最早生活在今天甘南的辽阔草原。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用“蕃马劲羊”换取汉族地区的粮食、食盐等生活用品。唐代，吐蕃民族崛起于青藏高原的一个强盛民族，党项部落受其侵扰被迫内迁。唐政府便把他们安置在今甘肃庆阳一带，后又为吐蕃所迫一部分迁往今陕西米脂、横山地区。因而人们将甘陇一带党项部落称为东山部，居于陕北地区的称为平夏部，元昊所属的拓跋氏就是平夏部里一支望族。党项族贵胄拓跋氏曾先后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和镇压黄巢起义，因功授封定难军节度史，占据了夏、绥、宥、银四州之地。在五代时期，实际上成为这一地区的割据势力。

宋初，太宗赵光义想趁党项上层贵族不和之机，削平其在夏州的割据势力。当即激起党项族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贵族青年首领李继迁，对北宋边将对党项族的残酷虐待和剥削十分不满，号召并领导党项族起来反抗北宋统治。经过反复争夺，李继迁攻占了宋朝在塞上的军事经济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县），改建西平府，奠定了大夏国开疆拓地的基础。李继迁在进攻西凉吐蕃政权时，受伤而死。其子李德明继承父业，他改变了与宋朝对立的策略，而是既结好辽朝，也密切同宋朝的贸易往来，并注重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使境内经济日益繁荣。他把军事目标指向河西地区的吐蕃、回鹘政权，以扫清向霸业的障碍。1028年，其子李元昊率兵突袭甘州回鹘，并在凯旋途中消灭了西凉吐蕃。1036年，李德明死，元昊加紧了称帝的步伐，设立百官，制定礼乐。创制西夏文字、建军等。在李德明在位的30年间，李氏父子先后平灭了瓜、沙、甘、凉、肃各州的地方割据政权。至此，西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占据了丝绸之路。其地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领土2万余里，已足以和宋辽抗衡。于是在我国的历史上进入了第二个三国时期。即宋、辽（金）、夏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三足鼎立的局面。（据新华网）

国民党在宁夏的党务活动

马万钧

我于1940年元月到宁夏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直至解放。历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党团指导科科长，宁朔县、同心县、银川市党部书记长。

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一贯是以党执政，以政统军。而在宁夏搞的是党、政、军一元化，马鸿逵一手握着宁夏的3个印把子。按正常情况马鸿逵应以省党部主任委员头衔执掌党务工作，相反他搞的是“军、政、党”而不是“党、政、军”。马鸿逵统治宁夏17年，口口声声称：“军事拥兵自卫，政治征兵征粮，党务貌合神离。”如1940年2月，省党部举办第一期党务人员训练班（我是学员），开学典礼上，马鸿逵就公开说：“在我看来，国民党有啥用呢？”他自恃边疆大吏，搞军阀割据，把国民党党部看作是政治累赘。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口号，给马鸿逵搞军事独裁以可乘之机，他在会议上公开说：“宁夏10万大军不调出去抗日，就是作为安定后方的力量。”因此他放手搞独立王国。在1945年11月省府科以上工作人员会议上他讲：“有人说我是土皇帝，我就是土皇帝！谁谁能把我咋样！”

1942年3月，我被委派为国民党同心县党部书记长，每次下乡工作，农民都称我为“党长”，说明国民党党部在宁夏只是一块空牌，民众普遍把国民党党务人员叫作“卖狗皮膏药的”。1945年6月，省党部召集各县市书记长工作会议，会上讨论如何吸收党员、发展组织的问题，有人主张大量吸收，有人主张重质不重量。会议开了两天，互相争吵一场，没有作出决议。省党部书记长周百铨、军法处长程福刚将会议勾画为“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冒然而来，肃然而坐，哄然而散。”这是宁夏国民党负责人的自供。

根据我在宁夏三任县、市党部书记长的经历，银川市党部还比较像个样子，其他各县党部除吸收了一些党员之外，实际上是空架子。

银川市党部的前身为宁夏省党部直属区党部。1945年1月正式改贺兰市党部为银川市党部。

市党部活动情况：

党务组织：大量发展新党员，特别是全市保卫甲长差不多都是党员，市党部共有12个区党部，72个区分部，党员约1600余人。

社会福利活动：1945年7月，市党部奉上级指示，以党员集股（每股10元，多认不限）筹集资金，在银川市西大街山河湾口，设立一所“社会服务处”，开办图书阅览、函授、夜校、咨询介绍、邮政代办等业务，并兼营旅社、餐厅，代办运输。社会服务处开业以来，既优待了党员（党员住宿八折收费），也方便了群众，得到群众的好评。可是不到半年，服务处就变成了私人发财场所，本利全光，也不知道钱都到哪里去了。

体育活动：市党部在全市机关单位组织篮球队，定期举行比赛，对银川市内的体育活动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日子不长就烟消云散了。

宣传活动：市党部成立了一个“新闻报道站”，利用茶馆，指定说书者事先先来一段读报、说报活动，宣传抗战形势和国内外简要新闻。同时，市党部还指定专人，每天把中央通讯社发出的通讯，用大字摘要抄写30张，分贴于街道口供人阅览，这种工作做的时间比较长。区分部的颁布：将全市46个区分部划分为7个区党部。即以省党部本身4个区分部划为第一区党部；以市党部为中心的7个区分部组成第二区党部；以实验小学为中心的8个区分部组成第三区党部；以盐务局为中心的6个区分部组成第四区党部；以《民国日报》社为中心的7个区分部组成第五区党部；以省回协为中心5个区分部组成第六区党部；原省银行下属3个区分部划为第七区党部。1946年前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各省、市、县党部要大量发展工农党员，因为银川市没有农民，仅有机械修配厂、光宁火柴公司、兰鑫机器厂等企业，规模不大，职工不多，市党部共吸收89名新党员。1947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各省、市进行党、团合并，即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内，撤销三青团。各级党团部的领导以党干为正，团干为副，原团部的书记、股长、干事与党部秘书、干事同等工作，团员即转为正式党员。银川市党团合并工作如期完成。党团员总登记：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党团合并之前已有指示，党团合并期间不发展新党员，并要求1947年12月底以前，以县、市党部为单位办理一次党、团员总登记。由区分部、团分队向县、市党部领取登记表，表格分前后两面，是党员又是团员的两面都填，只属一种的只填一面，均由本人自填，签名盖章，贴半身相片3张，交登记费2角，由区委会收齐后上报，并由县、市党部审验后一一加盖“已参加总登记”戳印。县、市党部党、团员总登记工作办完后，呈报国民党中央总部核发党证，但一直未发下来。建立情报组织——“党员通讯”：该组织设在国民党的区分部内，但又不同于“调统室”（中统）专搞情报。“党员通讯”只是指定党员为通讯员以收集各种情报，向区党部或市党部口头或书面汇报。党团员总登记完结，国民党中央党部指示：各省、直轄市党部经费由中央继续照发，各县、市党部经费改由各省市政府筹发。据知其他各省、市都照指示自筹经费，惟宁夏马鸿逵说：“省府拿不出这笔钱，各县、市党部只留一名录事看档案，其余人员一律转业从政。”因此，我在1948年2月1日到省回协工作。我虽离开市党部，但我还是最后一任银川市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所以在1949年9月宁夏和平解放后，我按照人民政府指示，把银川市党部手续向人民政府交代清楚，人民政府给我安置了工作。（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